

“楚文字學”的構建*

李守奎

[提 要] 自從作者提出構建“楚文字學”已將近十年,在對楚文字各個方面不斷研究的基礎上,對“楚文字學”的學科化建設深入思考,已經初步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楚文字研究提升為“楚文字學”,需要具備研究對象清晰、目標明確、方法有效、成果豐富、話語系統自洽、理論體系完備等諸多條件;楚文字學不是狹義的文字學的一部分,對於當時實用的古漢字的研究不能脫離文本、語境、歷史文化進行孤立的“文字”研究,而是以文字的釋讀為基礎,整理文本,釋讀歷史文化,反過來,在對歷史文化、文本語篇整體理解的前提下,更加準確釋讀與闡釋文字的“大楚文字學”;楚文字可以從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地域文字等不同角度觀察與研究;楚文字是地域文字,但地域文字的研究價值不能局限於差異,更要關注漢字系統的傳承與融合過程。該文是“楚文字學”的綱要,是古漢字地域文字學科化的初步探索。

[關鍵詞] 楚文字學 大楚文字 新學科 理論構建 地域文字 古文字

[中圖分類號] H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4 - 0005 - 22

2015 年,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舉辦的“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表達了“楚文字研究與‘楚文字學’的構建”的設想,得到大家的鼓勵和支持。2018 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楚文字綜合整理與楚文字學的構建”立項。十年期間,在持續研究楚文字的基礎上,楚文字學構建越發明晰。本文擬介紹我們對“楚文字學”的理解、具體的建設過程和楚文字學構建的新進展。

一、“楚文字學構建”是“大楚文字”的學科化建設

(一)“楚文字”研究與“楚文字學”

楚國銘文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宋代。二十世紀末,楚簡的大量發現可與十九世紀末的甲骨文媲美。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楚文字綜合整理與楚文字學的構建”(批准號:18ZDA304),古文字工程規劃項目“楚文字的綜合整理與楚文字學的建構研究”(批准號:G1450)、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古文字構形系統發展研究與數據庫建設”(批准號:2024JDZ048)的階段性成果。

美。自上個世紀下半葉以來，材料之豐富實為古文字之最，可以肯定，楚文字還會不斷有新發現。楚文字研究成果積累豐厚，日新月異，涉及語言文字學、歷史文獻學、考古學等多個學科，對很多學科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於重新了解先秦學術生態、重建古典學意義十分重大。對楚文字研究進行理論歸納，建設“楚文字學”，十分必要。

“楚文字學”與描寫性的“楚文字通論”不同，是楚文字專門知識的學科化，當以理論建設為主。“學科”這個詞是外來的，我國現有的學科作為現代知識體系，有國家標準，也在不斷發展。目前對高校的評估主要表現為“一流學科”的評估，學科建設是各個教學科研單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學科體系呈開放狀態，根據學術研究的進展，可以建立一些新學科，納入學術體系中。新學科最能凸顯學術的進步與創新。

楚文字研究的出發點是對出土文獻的釋讀與整理。楚文字研究學科化一旦研究對象固化到狹義的“文字學”範圍，離開文本、去語文化，就脫離了楚文字研究的根本目標。構建一個從實踐中來、能夠到實踐中去的新學科，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理解的“學科”的要點是：專門的知識系統及其在學術體系中的位置，獲取知識的方法以及知識系統的價值與應用。一個“學科”能否立得起來，需要看各個方面的建設程度：明確的研究對象、清晰的研究目標、可操作的研究方法、豐富的研究成果、完備的工具書系列、完整的學術史、系統的知識與理論、精確的話語系統、明確的學科定位，在學科體系內或現實中重要的應用價值，用於培養專業人才的系列教材等等。

第一，首先要確定楚文字學的研究對象與研究範圍。

“楚文字”是古漢字在傳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地域文字系統，是當時的實用文字，在出土楚文獻中記錄當時的語言與歷史文化，從中可以歸納出古漢字的子系統。楚文字學的研究對象不限於文字，也包括文獻文本。

古文字研究可以追溯到漢代。漢代的“古文”並不專指古代的文字，更多的是指以古文字書寫的文本。現代“古文字研究”從來也不是限定在文字學的範圍內，而是把與古漢字相關的所有內容都納入研究範圍，參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會刊《古文字研究》收錄的文章就可以了解大概。黃德寬先生最近發文強調了古文字學的交叉學科特性。^①“楚文字”是古文字的下屬地域文字，也必然是這樣的跨學科“大楚文字”。楚文字的載體、書寫、字形、所記錄的語言、文字編碼理據、構形過程、所形成的文本、文本的內容等等都是楚文字研究的對象。楚文字學是涉及古文字學、文字學、書法學、語言學、文獻學、歷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交叉學科。多學科交叉，並不是沒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各學科都以文字為核心，之所以不叫“出土楚文獻學”就是強調文字的基礎功能、核心作用。楚文字只有放在大學科體系中才能充分體現其價值，文字研究也只有對應用過程中活文字的深入觀察，才能發現各種現象與規律。

第二，楚文字學的目標。

構建楚文字學有三個基本目標：首要是歸納總結釋讀楚文字、整理楚文獻的理論。其次是歸納楚文字構成系統與研究方法，進行文字學的描寫與闡釋；最後是初步建立地域文字理論的框架。

第三，楚文字學的研究方法。

楚文字是文字，楚文字是漢字，楚文字是古文字，楚文字是地域古漢字。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都是相對成熟的學科，需要充分消化、吸收。各學科的研究方法既是楚文字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觀察楚文字的不同視角。但楚文字學必須從材料研究出發，歸納總結其自身的規律。

楚文字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取決於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與研究目標的確立。楚文字是秦代就被廢除了的文字，歷史上或隱或現，但都沒有被充分重視，留下的蹤跡很少。上個世紀前期，大宗楚文字材料開始出現，後期楚文書簡、古書簡開始大量湧現，盛況堪比漢代壁中書、晉代汲冢書。由於材料的獨特性，楚文字研究方法自然有其獨特之處。例如楚文字考釋是楚文字學的基礎部分，由於竹簡中有大量的古書，有的可與傳世古書對讀或不同抄本可以彼此對讀，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從以字形分析為主向文獻比勘為主轉變。楚人厚葬，遣策也入埋。考古發掘的墓葬遣策與所記載的器物同出，可以互相對應，古文字考釋與考古密切結合，彼此互證，是遣策文字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楚文字是活著的應用文字，可以觀察到字形與所記錄意義變化的過程以及所形成的字際關係等等。楚文字學是交叉學科，其研究方法一定是多元的。楚文字的研究方法還有待進一步歸納總結。

第四，楚文字研究與研究成果。

各種楚文字研究都是楚文字學建設過程中的一部分，是楚文字學構建的基礎。如果不能釋讀楚文字卻來建立“楚文字學”，一定是閉門造車，華而不實，毫無用處。楚文字學的建設與構建應當努力向裘錫圭先生的文字學學習，每一條規律都從研究實踐中產生。楚文字研究成果也是楚文字學的研究對象。搜集、整理、判斷、取捨是基礎工作之一，這方面的成果很多，但需謹防“工夫活”重複勞動。

第五，話語系統與理論體系。

建立起能夠清晰、準確表達的話語系統才能充分表述理論體系。學科語言要去除語文詞語的模糊性，建立起一套術語與理論系統自治。“楚文字”、“典型楚文字”、“楚常用字”、“楚疑難字”等等所指明確，研究才能深入，理論才能周延。楚文字術語系統、理論體系建立起來就是“楚文字學”的初成。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目前還有相當的距離。另外，作為一個有比較廣泛社會需求，可以持續發展的學科，還需要有完備的工具書，完整的學術史、系統的教科書等等。在當今新技術日新月異的背景下，也要跟隨時代的步伐，新技術研究和利用也是楚文字學的重要內容。

一個學科的建立不是幾位專家編出“楚文字學”就能夠完成。它是因應學術與社會發展需求、經過從業者共同努力的系統化理論，具有指導進一步研究的應用價值和長遠發展的前景。

(二)“楚文字學”構建的理論基礎與操作路徑

第一，古文字視域下的楚文字學。

楚文字是古漢字，是先秦的一種文獻用字，是當時的實用文字，楚文字學首先要遵循古文字的理論方法。楚文字在漢代是“古文”的一部分，當時關注的是經學部分。目前所知世界最早的文字理論就是發端於漢代學者整理古文文本過程中發明的“六書理論”。古文字研究是從文本中來，還要回到文本中去。以出土楚文獻為研究對象的楚文字學與古文字學一樣，構成三層釋讀目標：

上層：文字學、語言學、歷史文化等各學科充分利用，為各學科取材，深化各學科研究。

中層：完成文本整理，完成語篇的釋讀，為各個學科提供可信可讀的文本。

底層：文字釋讀，形、音、義互相求，核心是文本中所記錄的語言，是學科的基礎。

這三層目標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依託。只有釋讀了文字才能理解語篇，反過來，只有把握住語篇，考釋文字才不會走偏。文字的學習過程是釋字、組詞、造句、作文。古文字考釋有時需要倒過來，是在語篇、語句理解的基礎上確定文字所記錄的詞義，最後完成“完全釋字”。

“大楚文字學”不僅要對出土楚文獻進行釋讀、整理、描寫，而且要有宏觀的認知和多學科闡釋。較之甲骨文、金文等獨特載體、獨特用途的文字文本，楚文字有大量的古書文獻，上、下三層互

相求證會有更確切的認知和更廣闊的空間。

楚文字研究需要充分重視傳統語文學的價值,解決文獻中的各種問題。謹防學科化之後脫離實際,為理論而理論,為學科而學科的傾向。

第二,文字學視域下的楚文字學。

文字有其共性,所有的文字都是書寫的視覺符號,都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對於表音體系的文字來說,記錄語言是其唯一功能;對於漢字來說,儘管有多種功能,但記錄語言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楚文字也不例外,對楚文字的認識與研究要遵循文字的普遍規則。書寫的符號如果不記錄語言,或者說不能和語言符號相對應就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文字一旦失去所記錄的語言,就成了僵死的形體。日常語文中,文字所記錄的音義都是可知的。年代久遠的文獻語言中,有些文字所記錄的音義不明,就需要考釋,古文字考釋與文獻訓詁的核心都是考證文字所記錄語言的意義。楚文字在秦漢之間就一度消失,不論是漢代還是當今,出土的楚文字與現行的文字系統都有很大差異,考釋清楚其所記錄的語言是研究的首要目標,也是核心內容。只有全面把握了楚文字所記錄的語言,文本才能準確釋讀,才能成為歷史、文學、思想史各個學科研究的史料。離開文字記錄的語言研究文字,背離了文字的本質,研究道路會越走越窄,最後鑽進筆劃、偏旁之類的狹小空間。文字研究不能脫離其所記錄的語言,這是我們堅持的首要原則。

文字的本質是符號。戰國楚文字表意字記號化,字符記號化,假借字與本字的關係已經模糊,從符號的角度認識楚文字能夠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猜測。

第三,“漢字學”視域下的楚文字學。

這裡所說的“漢字”是文字學術語,不是漢代的文字,也不是六朝人所說的“漢字”。漢字是我國古老的自源文字,是運用多種編碼方式對語言符號再編碼,記錄語言、蘊含文化,具有多種功能的書寫符號系統,是表意字體系的典型代表。^②漢字最大的特點是源遠流長,古老的表意系統一直沿用至今,可以從源頭研究文字對語言再編碼的各種方式。第一部漢字學經典《說文解字》就開啟了這樣的研究道路,在這方面積累了巨量的研究成果。目前漢字學理論也在不斷前進。充分吸收漢字學的理論方法,溯源觀流,對其編碼方式、構形過程、發展演變有更深入的認識。

第四,地域文字視域下的楚文字。

地域文字研究肇始於上個世紀初期,王國維把戰國文字分為東土、西土兩系;郭沫若把兩周金文按國別區分,楚國金文辭已經是其中的一類;李學勤的戰國題銘分為六個區域,其中楚國題銘最為豐富;何琳儀把戰國文字分為五系,楚系文字是其中之一,目前已經被學界普遍接受。戰國文字地域特徵最為突出,所以地域文字研究主要集中在戰國文字領域。

楚文字學的構建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一些構想。

其一,“楚文字”研究的主要價值不在於建設一套理論來描寫楚文字,而是釋讀文字,整理文本,我們所說的“楚文字”大約相當於李學勤先生所說的“楚國題銘”。如果僅從文字學的角度著眼,歸納出幾條簡化、繁化的普遍規律,意義並不很大。

其二,戰國楚文字是成熟的地域文字系統,但“楚文字”不局限於戰國文字。以全部楚文字為研究對象,上溯可達西周,影響可及漢代。楚文字學包括楚文字的起源、發展、消失、再現的全部過程,可以藉此了解楚文化的傳播與傳承。

其三,充分消化吸收已有的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戰國文字學各學科的理論,不能閉門造車。沒有基礎理論,沒有理論思維,無法建構新的理論。理論是必要的,但我們反對理論先行,任何

理論都不能代替從楚文字研究實踐中歸納與概括。

其四,楚文字作為古漢字的一個地域分支,必有其特色,但無論是在漢字發展史上,還是地域文字體系中,不同地域漢字之間的共性都大於前後或彼此的差異。地域文字研究要防止為了強調特色而誇大差異的傾向。

基於以上的認識,套用目前時尚的表述,楚文字的構建是在“古文字視域下”、“文字學視域下”、“漢字學視域下”去理解與構建“地域文字”的理論框架。

(三) 楚文字學建設的過程

作為一個重大項目研究課題,研究方法已經經過論證,在實際操作中還需要不斷調整、完善。

第一,理論準備。多年來,我在研究楚文字的同時,關注文字理論,注重規律的總結。近出的《漢字理論與漢字闡釋概要》其中的“漢字理論部分”只是一個概要,雖然還很粗糙,但有這麼個理論基礎,有利於把楚文字放在文字學、漢字學的理論視野下觀察。

第二,文本的二次整理與深入研究。各個時期的出土文獻整理成果都是階段性的成果。古文研究有價值的成果都是對文本深耕的結果。課題組對文本進行深入研究與二次整理,重新審核行款、編聯、釋讀等,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寫出新的釋文。結合課堂教學,我個人也帶領同學完成了一小部分,例如對信陽簡進行了重新編聯釋讀,對楚帛書的形制、釋讀、內容進行了比較全面的再整理等。如果深入研究,對於出土楚文獻,我們確切知道的是少數,不懂的是多數。文本釋讀這一關不過,可以說就是還沒有入門。

第三,文字研究與整理。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處理文字字形,對楚文字進行系統的整理,建立數據庫,將所有楚文字錄入,完成對楚文字的綜合整理,完成專題文字編與楚文字全編。文字編定位為“學術著作”,其學術含量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釋字水準,主要在於前期文本研讀;二是文字學闡釋,主要是對構形理論的把握。至於其工具書價值則取決於用心、用功的程度。

第四,楚文字學專題研究。楚文字材料很多,涉及領域非常寬廣,深入研究需要集體合作。多年來指導博士生研究,與博士後合作,各個擊破,在“大楚文字學”三個層級不斷耕耘。具體情況在下一節介紹。

第五,經過多年在楚文字各個領域的建設,最後加以理論概括,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

二、楚文字與楚文字學術史

以“楚金文辭”、“楚國題銘”、“楚國文字”、“楚系文字”、“楚文字”、“出土楚文獻”等為研究對象的研究成果已經積累得非常豐富。楚文字考釋、文本整理、研究成果匯集、工具書編纂等等,各個方面都有專題研究,可以進行專門的學術史梳理。下面著重介紹課題組在楚文字學建設中的一些工作與成果所構成的楚文字學框架。

(一) 楚文字的來源、形成與發展

“楚文字”作為古漢字體系中的一種地域文字,一方面隨著楚國的興亡而興衰,從接受、發展、地域特色形成、使用範圍擴張、消失到再現,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隨著不同的文化需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視與重視。

楚文字中的“楚”,涉及到楚人、楚族、楚國、楚文獻、楚文化等不同內涵;“楚文字”也包含著楚人用字、楚系文字、楚國文字、出土楚文獻等不同的角度。

楚族的起源學術界有很多不同意見,目前難有定論。最晚商周之際,楚人已經在漢水流域荊山

一帶定居,根據目前所知一些信息推斷,楚人應當是在商代末年接受漢字,進入文明歷史階段。

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楚文字屬西周晚期。從以下兩點略可推測其更早的源頭。《史記·楚世家》記載楚人的世系,把穴熊與鬻熊分作兩人,鬻熊之前的世系不明。鬻熊生活於商末,自鬻熊之後的世系非常明晰。出土文獻與《楚世家》等古書互證,鬻熊與穴熊是同一個人。從出土文獻看,此人之前的世系也是模糊不清,其後的世系二重互證高度一致。這就說明,鬻熊之前的記載很可能是後人對楚人傳說的整理,鬻熊之後楚才有了成文史。另外,出土楚文獻中鬻熊還有其他異稱,都是楚人的始祖,大都帶有神性,還帶有不同程度神話傳說的色彩。種種跡象表明楚國在商末周初已經有了成熟的文字,有了成文的歷史記載,已經從傳說時代走進文明歷史時代。這個時候的“楚文字”應當就是對商周文字的接受。到了西周後期,楚人使用的文字已經開始出現一些特色,例如楚公家鐘的“家”字寫作“豕”。

東周時期,楚人崛起,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楚文字的使用範圍也在擴大,從南陽盆地,到淮河流域,一路北上東擴,鄧、申、江、黃,滅國無數,楚人使用的文字與被佔領地區的文字彼此融合,形成“楚系文字”。楚人是否對所滅國或控制區實施文化強制政策無法得知,但結果是廣大疆域內形成了共同的文字特徵,例如楚與徐的銅器銘文高度相似,難以分辨。由於被楚覆滅列國的銅器難以確定是被滅之前的列國器還是被滅之後的楚器,這個時期用“楚系銅器”、“楚系文字”概括就顯得更加嚴謹。到了戰國時期,列國被滅亡,楚國擴大到長江下游,疆域明確,楚國文字成為特徵明顯的地域文字系統。

“楚文字”並不是一個自我封閉、與其他列國完全對立的系統。由於文化交流,在使用過程中列國文字之間會彼此影響。《詩》、《書》等不同底本古書傳入,用楚文字轉寫,經過吸收、改造、融合,逐漸完成楚化的過程,其中一部分外來成分保留下來了,也會成為非典型楚文字的一部分。

楚國滅亡後,楚文字作為一個系統已經消失,但部分文化特徵繼續傳承,例如在楚故地出土的漢初馬王堆帛書,其中的一些文字就保留了楚文字的特徵。

漢代文獻復興,淮南王等在楚國故地搜羅文獻,其中當有大量楚文字,楚文字是漢代古文的重要來源。當今楚文字大量湧現,已經成為一時之“顯學”。

楚文字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內涵各有側重。早期是楚人借用商周文字,應當還沒有地域特色;中期是楚國通行文字的形成與對其控制區域列國文字的楚化;晚期是具有共同文化特徵的楚國文字與他國文字的融合。對於“楚文字”,需要動態觀察,不能一概而論。《楚文字的歷史發展與地域文字系統的形成》一文對楚文字的形成與發展有初步的探討。^③目前材料日多,可以進行更加細緻、深入的研究。

楚文字一度消失。秦滅楚之後,先後實行文字統一(秦始皇 26 年)和禁書焚書(秦始皇 33 年)政策,楚文字與楚文字書寫的楚文獻先後消失。漢代文獻復興,古文再現,其中的楚文字並不以地域文字見重,今古文合流後,很難確認和剝離。宋代金石學發達,趙明誠已經明確判斷出楚器上的文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等字書取材廣泛,其中也當有楚文字,也沒有加以分別。楚文字成為關注的焦點是上個世紀楚簡帛古書大量發現之後,材料的獨特性開啟了與其他地域文字不同的研究道路。

(二) 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

楚文字學構建首先需要明確什麼是“楚文字”。“楚文字”是一個動態發展,內涵豐富的概念,很難用一個定義囊括各個時代不同特徵的所有對象。理論需要符合實際,需要對複雜的問題具有

解釋力。例如楚人抄寫齊地傳入的古書，文本中可能用楚文字轉寫了一部分，也保留了一部分齊文字，有些文字構形甚至可能是齊、楚不同特徵糅合為一體。作為文字系統，依舊是“楚文字”，但文本的一些文字構形與應用不符合典型楚文字的特徵，甚至與楚文字對立，與齊文字相合；與楚文字不相合的程度也有所不同。這樣複雜的問題很難用是楚文字還是齊文字來簡單判斷。我們借用認知語言學中語義典型特徵與非典型特徵等理論，提出“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根據地域文字的特徵對其進行分級認知判斷。

把具有共同特徵的事物歸納為一類形成概念，以語音做標記就成了語言中的詞。詞義認知表現為對這類事物的各種特徵的把握，有典型特徵，有非典型特徵。具備所有典型特徵和大部分非典型特徵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如男與女，典型特徵是性別區分，還包括體貌、社會分工、衣飾等方面方面的特徵。長著鬍鬚，體格健壯，田野耕作，勇敢殺敵，男性髮型……這些特徵具備得越充分作為男人就越典型。漢字“男”就是抓住了男性田地耕作的社會分工的語義特徵來編碼構形。一個男人也可以不長鬍鬚，不去耕作，性情柔弱，喜穿花衣……在傳統認知裡就是不典型的男性，但依然是男性。這種詞義的理解遠比給下個定義更符合實際，也更能說明問題。

楚文字隨著楚與周的政治分裂而逐漸形成其地域文字，戰國時期在字體、構形、應用等方面形成鮮明的特色，形成了典型的楚文字。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的研究價值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確定判斷楚文字的標準和楚文字的研究範圍；第二，觀察並解釋楚文字的地域特徵的層級性；第三，解釋外來文本在楚地的楚化程度。

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不限於個別文字構形，還要觀察整個文本的用字特徵，著眼文字的系統性。其研究必須結合文本展開，具有可操作性，其結果具有解釋力，才能發揮其學術價值。

首先，確定典型的楚文字。作者是楚人，書寫者是楚人，使用範圍在戰國時期楚地核心區域或楚化程度很高的佔領的楚地。按照這樣的標準，可以從各類文書、禮器、量器、符節等禮儀性、規範性、實用性文本中篩選出典型楚文字。

第二，對典型楚文字深入研究，書寫與載體、表層結構與字體，深層結構與構形過程，所記錄的語言與字際關係等等，研究越深入細緻，對楚文字特徵就了解越全面。

第三，以典型楚文字為標準，觀察各種文字文本，對各種楚文字特徵加以細化、量化，判斷文字分域理據的充分程度，判斷外來文本的楚化程度。

典型楚文字具有全部或大部分楚文字特徵；非典型楚文字就是不充分具備楚文字特徵，或有與典型楚文字特徵相對立的因素。例如楚璽的判斷，需要先確定楚璽的特徵，可以概括為：1) 內容符合楚制楚事；2) 構形符合楚文字發展規律；3) 字體，陰刻白文，筆劃粗而婉；4) 形制為楚璽常見；5) 出土於楚墓等也是邊緣特徵，可以起到一定的佐證作用。

長沙楚墓所出的姓名私璽“登(鄧)紳”，“黃惑”，^④完全符合這些特徵，是楚姓名私璽無疑。《古璽匯編》收錄的 2631 號姓名私璽“行可”陽文小印，^⑤學者多歸入三晉璽，就不一定可信。^⑥

陰刻白文是楚璽的特徵，但並不代表所有的楚璽都必須具備這個特徵。例如《古璽匯編》2634 號“行慎”，也是誤入姓名私璽的吉語璽。“慎”字的文字構形地域特徵很突出，秦作“慎”；齊與《說文》古文同，作“𢔿”；楚作“𢔿”。《秦文字字形表》收錄的“𢔿”字，陳劍先生很早就釋讀為“慎”。^⑦這個

字見於侯馬盟書,很可能是三晉的“慎”字,清華簡《厚父》也有此字,很可能源自三晉文字的底本。

表 1 “慎”字構形地域差異表

楚	秦	齊	晉
 訢 左塚漆棺	 慎 北大秦簡《算書甲種》31	 脊 《集成》245	 晉 《璽匯》4284

從構形與應用統計上看,“訢”及其變形是典型的楚文字。在楚簡古書中,有些“慎”並不都是典型的楚文字,郭店簡《語叢一》簡 46“脊”是齊文字特徵,清華簡《厚父》簡 7“愆”是三晉特徵。這些文字進入楚地,尚未完成楚化。在一篇楚地出土的文獻中出現一些非典型楚文字,並不能從整體上否定是楚文獻。

反觀 2634 號的“行 訢(慎)”璽,除字體陽刻朱文符合三晉璽典型特徵外,都與楚璽特徵吻合,認定為非典型楚文字比定為三晉璽證據更加充分。如果“陽文小字”是楚璽文字的邊緣特徵之一,一些陽文璽的國別就需要重新思考,像《璽匯》3368 陽文“大福”定為楚吉語璽更加可信。^⑧

就楚吉語璽來說,陰刻粗筆白文是典型特徵,陽刻細筆朱文是邊緣特徵之一;就三晉璽來說陽刻細筆朱文是其典型特徵。根據這個特徵只能判斷出屬於晉璽的可能性大而已,但不能排除是楚文字的可能。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可以讓我們走出非此即彼的簡單化認知。

典型楚文字對於楚地出土文獻的性質判斷有所幫助。概括為典型楚文字與非典型楚文字理論對古書文本的傳抄過程有更好的解釋力。古書來源不一,如果一個文本都是典型的楚文字,楚人原創的概率就很高;如果非典型楚文字突出,是尚未楚化或楚化不夠充分的外來文本的可能性就很大。清華簡全部是古書,整理已經接近尾聲,其中哪些是楚人的原創,哪些是外地傳入,從哪裡傳入,這些問題還沒有系統研究。另外,充分認識楚文字特徵對於考釋楚文字以及西周文字、殷商文字也有所助益。

典型楚文字研究,朱惠琦博士做了一些嘗試,目前還停留在初步探索階段。

(三) 楚文字的發現與研究——楚文字學術史

一個學科之所以有必要建立,其前提條件就是其研究對象有足夠的廣度與深度,積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其萌芽、發展、興盛、擴展的過程與原因可以描寫和闡釋。對於楚文字來說,學術研究隨著材料的發現展開,成果日益豐富。六國文字中目前楚文字獨大,楚簡文書、古書的大量發現,可以填補很多學術史上的空白,甚至可以改變對先秦學術狀態的整體認識。從學術史的角度,對楚文字的發現與研究加以描寫、紹介、歸納、判斷和評述,能夠十分豐富,可以撐得起一個“學科”。

學術史建立在對研究對象全面把握的基礎之上,展現其前因後果,忌諱流水帳式的材料堆砌,需要揭示出每一個時期的學術成果產生的原因與影響。

我在二十多年前寫過一篇《出土楚文獻文字研究綜述》,非常粗疏。課題組目前對楚文字及相關研究材料已經整理完畢,以時間為線索,努力對“大楚文字學”進行全面、準確描寫與總結。博士生林康關注楚文字研究的學術史,正在進行此項研究。

綜合以上三節,我們認為楚文字是留存在各種載體上的一種古漢字,是楚人自商末借用漢字,

經過長期發展,到戰國時期形成具有明顯特徵的地域文字系統。

三、古文字視野下楚文字學構建

(一) 楚文字書寫的載體與簡冊形制

文字是書寫的符號,書寫必須具備書寫工具、書面載體等物質技術條件和書寫能力。楚文字較之其他地域文字最大的特徵就是出土了帛書和大量的竹簡,尤其是大量的古書實物。

商代就有典有冊,有留存在玉器、陶器等無機物載體上用毛筆書寫的字跡。可以肯定,用毛筆在簡牘上書寫是漢字自有了成熟的文字系統以來實際應用的主流。毛筆與簡牘這些有機物難以保存,時代越早就越難以發現,很長時間內我們的先秦文字發展史是在缺失了主流文字載體的條件下的片面認識。戰國時期楚簡古書的大量發現,彌補了一段空白,讓我們對古書的形制有了真切的感受和認知,已經受到學者的關注,積累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對楚文字載體的深入研究及價值的開發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文字的載體對文字構形有影響,例如現實中的馬、虎、豕、犬等都是首前尾後、四足著地,但古文字中大都是首上尾下、四足懸空,這是為了適應竹簡不便容納寬度大的形體而產生的構形方式。龜甲與獸骨即使寬度足夠,但這些文字構形還是呈這種首上尾下的長方形,正可以說明在竹簡上書寫的字形已經成為習慣。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楚簡文字,也延續至今。

竹書載體的形制對文本復原的作用尤其突出。楚文字研究的首要目標是文字釋讀與文本復原,這二者相輔相成。對於失序殘亂的竹簡,能夠正確復原文本,就意味著文字已經基本可以正確釋讀,文意能夠貫通。所以文本復原是出土文獻整理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對於殘缺嚴重的古書來說,依靠文意復原有很大風險,竹書形制是綴合編聯的首要條件。

竹書對傳世古書研究也有諸多啟示。古人很早就發現了錯簡、脫簡等現象,但沒有實證,多為可備一說。我們現在知道先秦古籍經過漢代學者用今文字的系統整理,其中必然會有一些訛脫、錯簡等問題,有些讀不通的地方,需要我們換一種角度考慮。

賈連翔博士從始至今參與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有機會直接從一手材料入手,對竹書形制有深入的研究,在清華簡綴合、編聯、分篇、釋讀過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先後出版了《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出土竹書的微觀考古與復原》等著作。在楚文字學框架下,對楚文字的書寫工具與載體、書寫特徵、古書形制等問題進行規律性總結,從書寫物質形態的角度觀察楚文字,可以大大推進先秦古書在載體形制方面研究的進展。

(二) 楚文字疑難字與楚文字考釋

長期以來,古文字中疑難字的考釋是古文字研究的核心,已有的各種古文字考釋方法主要是針對疑難字,疑難字考釋在古文字研究的各類論著中佔很大的比重。對於新發現的已經不使用的文字文本來說,疑難問題很多,疑難字是首先面對的攔路虎。疑難字不僅要一字一字地考釋,而且需要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釋讀的規律與方法。

什麼是疑難字?每一個文字符號都包括三個基本項:其一,視覺可見的形體——表層結構;其二,這個形體所記錄的語言單位——文字所記錄的語言;其三,形體與所記錄語言之間的聯繫——深層結構,亦即編碼理據。就文字個體來說,這三個方面都完全弄清楚就是“完全釋字”。^⑨每一個字所記錄語言的音義大都不是單一的,在文字系統中構成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理清歷時的演變過程與共時的字際關係是更高的要求,也是文本釋讀的必然要求。即使是兩千多年前的楚文字也經

歷過了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到了戰國時期表層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記錄的語言與我們所熟悉的秦漢以來形、音、義系統也有很大差異,大部分表意字的構形理據不溯源就只能視同記號。嚴格地說,只要未達到“完全識字”就是“疑難字”。

疑難字根據其難度可以分為不同的級別。我們以 1984 年湖南長沙市塗家村廢銅倉庫揀選所得的燕客量為例加以說明。量銘 59 字(含合文 3 字),下面是我們的釋文:

郢(燕)客 臧(莊)嘉駟(問)王於藏 郢之 戡(歲)膏 = (享月)己 酉(酉)音 = (之日),鄢(羅)莫囂(敖) 臧(莊)市(師)、連囂(敖)屈圭(上)巳(以)王命命攻(工)尹穆 酉(丙)、攻(工) 鎔(佐)競(景)之、窶(集)尹陳頤(夏)、少 窶(集) 龔賜、少攻(工) 鎔(佐) 李(李)癸,鑄廿金 削以 盥書(故) 𠂔(筭)。

第一級,字形結構、所記錄語言單位的音義、構形理據都不明確的不識字。例如量銘最後兩個字“ ”,從最初釋文缺釋到《集成》釋文作“告(造)七月”,都是完全不識字。

第二級,表層結構明確,記錄的語言不明。例如“盥”,字見《廣韻·卦韻》去卦切,義為“盥,盥記人物”,沒有用例,不知所云,無助於銘文釋讀。

對於疑難字考釋來說,只要文字所記錄語言的音義明確,文本可以通讀,就已經完成了最重要的考釋,對於文獻訓詁來說,只要看清文字結構,與後世文字對應,確定文本中的音義就可以算作“已識字”。下面的層級主要是文字學探討的需求。

第三層,記錄的語言明確,表層結構與構形理據不明。例如人名“陳夏”,“陳”字右側部件“”非“東”非“重”,其深層理據很複雜。

表 2 燕客銅量疑難字變化表

《江漢考古》 ^⑩	《集成》 ^⑪	《教程》 ^⑫	存疑與深化
邗	(郢、燕)	(郢、燕)	
栽	藏	藏	藏 郢的歷史地理問題
□	享	高	隸定的原則
栖(酉)	酉	酉	“酉”的構形與酉的區別
𨾏	羅	鄢	地名用字分化與分化失敗
陳(陳)	陳	陳(陳)	“陳”音符的來源 ^⑬
允	市(師)	市(師)	“市”的構形理據
李	孝	李(李)	“李”字的來源與深層結構
削	𠂔(桶)	削(半)	形音義:“桶”與“半”
盥	盥	盥	意義:測量或更換
	告(造)	害	意義:“故”與“胡”
	七月	𠂔(筭)	
12	5	3	

第四層,表層結構部件清晰,構形理據不經過上溯則不能知曉。“少攻(工) 鎔(差一佐) 李

癸”，其中“𠂔(差)”與“𠂔(李)”上部構件完全相同，但來源、功能完全不同。

“疑難字”的考釋方法主要是構形分析與文本中的音義判斷。釋讀的標準有兩個方面，一是讀通文本，確定所記錄的語言；二是文字學依據，符合文字構形與發展的規律。

“疑難字”隨著研究的深入，疑難的程度會逐漸降低，有些最終會達到完全識字。燕客量 59 字，1987 年《江漢考古》、2007 年《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2024 年《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三個階段疑難字的變化(見表 2)。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釋文中，有十二個字不識或錯釋，另有“連”、“癸”雖然正確釋出但還不能確定，全篇有五分之一以上的疑難字。經過近二十年的研究，從文字釋讀層面只剩下“𠂔”、“𠂔”、“𠂔”、“𠂔”、“𠂔”五個字了。又過了將近二十年，銘文釋字與釋讀大部分解決。目前還有三個方面的“疑難”：

第一，工尹穆丙等“鑄廿金削，以𠂔𠂔(故)𠂔(筩)”的釋字與釋讀還存在不同意見。《教程》以“削(半)”為量器名，訓“𠂔”為測量，鑄大器以測小器，還不能無疑。劉波認為應該讀為“鑄二十金桶，以易故筩”，意思是穆丙等受命製造了這些桶形量器，替換了舊的量器筩，文通字順，也可備一說。^⑭

第二，文字的深層結構不明或認識不同。

第三，隸定原則不同，有些隸定不能準確表達文字的構形。

如果按照“完全釋字”的標準，楚文字中很多字還是不同程度的疑難字，需要去考釋。對於疑難字來說，“一個字就是一部學術史”的確切含義應當是把它放在時、空框架中，對其字形演變、所記錄音義的全部，構形理據的形成、喪失與再造，作為字符的構形功能，字際關係等的全方位研究，這樣就可以以某一個字為中心形成一個彼此關聯、彼此互證的字群，形成由點到面的研究。

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是十分必要的。疑難字考釋隨著新材料與新方法不斷推進，按照楚文字學術史劃分時期，歸納每一個時期用什麼方法正確釋讀了多少，留存了多少疑難字，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做下來，弄清楚文字中還有多少疑難字以及疑難的級別，不僅可以弄清楚文字考釋史，而且可以對疑難字考釋起到指引作用。

疑難字研究是個開放的領域。隨著新材料的發現，不僅有新的疑難字出現，而且會發現過去的“已識字”中的“疑難字”。例如甲骨文中的“視”字長期被釋作“見”，既不難也無疑，隨著楚竹書與傳世文獻的對讀，才得以區分。區分後又有混淆，產生新的疑難。

侯建科的博士學位論文《楚文字疑難字考釋史研究》(清華大學學位論文，賈連翔指導，2022 年)對疑難字考釋史進行了詳細的梳理。常用字與稀見字相對應，疑難字與已釋字相對應，這是兩個不同的研究角度。但稀見字常常就是疑難字，常用字中也有疑難待解決。侯瑞華博士在常用字研究的同時，對疑難字考釋與疑難字理論有深入思考，進一步提升的研究工作正在進行。

(三) 楚文字常用字研究

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領域一向不太關注常用字。從文字應用與文本釋讀著眼，文字系統中的常用字是最重要的。常用字不僅使用頻率高而且大都歷史悠久，構形功能強。任何時代，掌握三千多字能夠滿足日常應用，掌握五千字基本上能夠解決文獻閱讀的問題。楚文字是當時人們實際應用的文字，我們今天研究楚文字的首要目標也是讀懂其所記錄的語言、所書寫的文本，發揮其在各個學科中的文獻史料價值。隨著楚簡竹書的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文史工作者有閱讀出土楚文獻的需求，如何在較短的時間內讀懂楚文獻是楚文字研究的重要目標。

以應用為目的的現代漢字學習一定是從常用字開始。現代漢字常用字研究很成熟，其研究方

法可以借鑑,但並不完全相同。楚文字常用字不僅表現在使用頻率,而且表現為構形功能,其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下列幾個方面:

第一,常用字掌握直接關係到楚文獻的閱讀。掌握兩三千常用字,基本上就具有閱讀楚文獻的能力了。

第二,常用字大都具有較強的構形功能,有利於楚文字系統的理解。楚文字中的音符、意符與區別符號大部分來自常用字,很多孤立的形符在發展過程中也會離析或類化為熟悉的常用字符。

第三,常用字大都是自古及今的傳承字,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在文化傳承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楚文字與商代文字、西周文字同源,同屬於我們所說的“漢字”系統,即使到了文字異形的戰國,列國地域文字各有特點,但依舊不至於彼此完全看不懂。漢代學者能夠迅速隸定、釋讀“古文”,也是因為常用字的穩定性與傳承性。

第四,常用字大都記錄多個意義。楚文字與所記錄語義的對應關係與秦漢以來的對應關係很少完全吻合,例如上面所說的楚文字中的“酉”與“𩚑”是兩個字形,“酉”所記錄的音義是{酒},“𩚑”是地支用字{酉},這與秦文字以來“酒”與“酉”的區別方式完全不同。如果以我們習慣的用法去理解楚文字的“酉”就會完全扞格不入。

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在文本釋讀與楚文獻應用等方面價值很高。

古文字常用字研究很薄弱,目前僅有《金文常用字典》、《甲骨文常用字字典》。前者是有構形分析和注音、義項的字典,後者主要是按現代讀音排列的字形表。常用字理論建設還很少被關注。

楚文字常用字研究建立在對所有楚文字釋讀、應用調查的基礎之上,需要研究和處理大量的材料,難度很大。侯瑞華的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楚文字常用字研究》(李守奎指導,2022年)對楚文字常用字做了深入的研究,論文先後獲清華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北京市優秀博士論文,基本上完成了楚文字常用字的理論構建,考釋了一批楚文字常用字,列出常用字表,目前受國家社科基金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出版項目資助,現已出版。楚文字常用字字典也在撰寫中。

(四) 楚文獻文本整理

不論是狹義的“古文字”還是廣義的“大古文字”研究,從古至今都離不開出土文獻的釋讀與文本的整理。對於古文字研究來說,一旦脫離開文獻文本,向著狹義的文字學方向“學科化”,就會脫離文字記錄語言的根本,理論越來越完備,但距離實際需求可能會越來越遠。楚文字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文獻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需求是重要原因。楚文獻的文本整理不僅是“楚文字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楚文字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這裡說的出土楚文獻與楚文字相對應,是用楚文字書寫的文獻,簡稱楚文獻,其整理包括初始整理報告與公布之後的再整理。

金石學領域中的楚文獻整理多以題跋或釋文的形式,內容與形式另有規矩,與全面的文本整理差距很大。戰國文字研究的興起與楚文字密切相關,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先後出土了兩批重要材料——李三孤堆楚幽王墓銅器銘文與楚帛書,這是上個世紀前半葉所見到的兩批最大宗的戰國文字材料。但由於都是盜掘出土,大部分很快流散海外,很長時間缺少成熟的整理文本。五十年代後楚簡面世,但數量少,大量楚文字未能釋讀。四五十年代出土的楚文獻即使幾十年後的再整理,有些依舊是整體不明,強加註解。

出土文獻整理是原創性科學研究,運用文字、音韻、訓詁、文獻多方面知識解決文本釋讀過程中的各種問題,目標是盡量準確無誤,讓學界能讀懂和放心利用。六七十年代先後發現的望山簡和曾

侯乙墓簡、曾侯乙墓銅器銘文等是考古發現的大宗楚文字材料，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等先生對其深入研究，確定了整體把握、謹嚴求實、不知則闕、精確表述的楚文獻整理範式。

八十年代之後，楚文獻日益增多，整理報告層出不窮，或精或粗，各有特點。我有幸在李學勤先生的指導下參加清華簡的整理，對文獻整理的過程與得失有了比較真切的了解。

整理報告是少數學者原創的階段性成果，必然會存在各種問題。學者可以在整理報告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有些整理報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整體不明，疏漏百出，公布後學者會群起修正。經過一定時間的沉澱，相關研究成果積累到一定程度，文獻解讀可能會取得局部或整體的突破，就需要在充分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文本的再整理。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與湖北省博物館聯合對楚地出土戰國簡冊進行系統的再整理，已經出版了湖北地區所出土的十四批楚文獻的整理成果，質量很高，是楚文字研究必備的參考書。

對於楚文字研究者來說，會自覺不自覺地持續進行楚文獻的再整理工作，從字詞訓詁到語篇文意，從語言文字到歷史文獻，從文本文獻到思想歷史，從局部問題解決到文本整體突破。如果有必要，對再整理成果可以進行再再整理，這方面的學術成果非常多。近年來，我也著手對楚文獻進行再整理工作，與趙相榮合作完成了《信陽簡遣策分組編聯與補釋》。^⑮對楚帛書進行了全面再整理，目前已經發表了《楚帛書乙篇的文本復原與文字辨釋》、《楚帛書的圖文結構與神話敘事》（與胡霖合作），^⑯與胡霖、趙相榮合作的《楚帛書再整理》初稿已經完成。

楚文獻文本整理與再整理十分重要，建立一門“出土文獻整理學”也未嘗不可。梳理楚文獻文本整理的發展史，探尋方法，總結得失，予以理論概括。

楚文獻文本整理大都面向學術界的研究需求，讀起來大都佶屈聱牙，令人望而生畏。楚文獻中的很多內容可以面向大眾，目前通俗普及的整理文本還很稀缺。

（五）楚文字與甲骨文、金文互證

古漢字地域文字都有共同的源頭，它們同屬於一個大文字系統，但傳承關係與發展道路不完全相同。楚人地處南國，周人建立曾、唐諸姬加以鎮撫，但隨著楚國勢力的不斷擴大，春秋早期湖北大部與南陽盆地就成為楚人控制的區域，其文字傳承與遠在西北的周秦有所不同。有些商、周的古體字只在南國流傳。更重要的是楚簡中的實用文書、古書，與具有特殊用途的甲骨文、金文等不同，有些可以和後世文獻對讀。

當把楚文字放在歷史的過程中，放在古漢字系統去考察，會呈現多重價值。從宏觀來看，可以探討中華民族的融合過程；從微觀來看，可以借助楚文字考釋商周文字，也可以利用商周文字考釋楚文字。

商周上下結構的古文字中，處於下部的“人”與“亼”大部分是對立關係，例如“見”與“視”、“祝”與“兄”、“鬼”與“畏”等等。但在以秦文字為主的《說文》系統中，形體已經訛混為一，以《說文》為依據的古文字考釋就會誤加混淆。依靠文獻對讀釋出楚文字的“視”，甲骨文中的“視”自然就可以從“見”中區別出來。

利用楚文字考釋甲骨文與金文已經取得很多優秀成果，利用甲骨文與金文考釋楚文字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徑；楚文字很多已經記號化，構形理據大都需要上溯。楚簡中的“𠂔”（包山簡237）表層結構是“𠂔”，只有上溯到甲骨文，才能明確是“毓”字的省形。

把楚文字放在歷史發展中觀察，不僅有助於文字考釋，也可以深化、細化古漢字發展史。《說文》中“毓”是“育”的或體，從商至秦漢其傳承關係十分清晰。清華簡《楚居》中有“𠂔”字，即使正

確隸定為“毓”，也不見於字書。這個形體在春秋時的曾文字中也出現過。“毓(育)”字在西土、南土有不同的傳承發展：

表 3 “毓”字西土、南土分化表

	商	西周	春秋	戰國	《說文》
西土	 《合》22663	 《集成》4341		 秦駟玉版甲	
南土	 《屯南》469		 《新收》530	 《楚居》簡 2	

“毓”字的發展脈絡讓我們比較清晰地看到商代以後文字南北分化的過程。

楚文字與商、周文字互證尤其需要古文字前後貫通。李春桃教授對古文字與計算機信息處理有精深造詣，正在運用大數據總結楚文字與商周文字互證的相關規律。

以上五節是基於古文字理論與目標的楚文字學。楚文字學首先要服務於楚文字考釋、文本整理、楚文獻應用等。我們沒有按照文字學、漢字學、古文字學、楚文字學由大到小的順序展開，主要是出於對楚文字學價值的認識——楚文字學的價值首先在於古文字學。

四、文字學視野下的楚文字研究與地域文字學的構建

(一) 楚文字的表層結構與書寫

文字是書寫的符號，書寫工具、載體與書寫過程是導致字體差異的直接因素。商代的甲骨文“書寫”用刀類契刻工具在龜甲獸骨上刻寫，金文的“書寫”要經過毛筆書寫、製範、鑄造等複雜的過程，工具、載體與書寫過程表現出不同的字體面貌，相關研究已經非常深入。

文字是視覺的符號系統，文字學關注的是書寫的結果，即這套視覺符號的構成。文字系統首先表現為一套形體彼此區別的形體符號，文字結構也首先表現為視覺可見的表層結構。這套符號的表層結構系統可以分析，可以描寫。

表層結構的底層是幾十個形狀不同的筆劃，筆劃組合成構字部件，部件組合成字形，字形群體表現出共同特徵就是字體。我和肖攀曾在《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一書中對清華簡《繫年》的筆劃、部件和字形進行過拆解、歸納，進行過解剖麻雀式的探討。就楚文字來說，理論上可以進行更加全面的分析、描寫、歸納。區分為西周至春秋和戰國兩個階段分別研究，觀察楚文字字形字體的特徵以及發展變化，具有一定的意義。這種脫離其所記錄語言的形體研究是文字學的一個方面，單純的表層結構研究對於古文字釋讀沒有太大作用，但與書法學十分密切。

漢字表層結構分析有利於漢字的書寫與教學。現代漢字由直接構字的區別部件構成八種表層結構。識字積累到一定的程度，應用者都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建立起一套表層結構系統去釋讀和書寫，只有這樣才能突破識字障礙，變得越來越容易。楚文字也是這八種表層結構，古今基本一致。

表層結構首先關注的就是形體之間的區別。對於非區別特徵，可以淡化甚至忽略。例如“釋”字左側不是“采”，“冒”字上邊不是“曰”等等，對於符號區別毫無意義，為了照應已經不能表達理

據的“理據”，只會增加識字的難度。楚人在書寫過程中，把一些沒有區別功能的部件進行了簡化、合併和類化，這方面的規律很值得總結。

表層結構追求形體的視覺之美，均衡、豐滿等是其基本原則。早期漢字表意字較多，形符構形，隨體詰詘，大小不一，隨著漢字的形聲化，整齊劃一成為趨勢。楚文字中為了字形美觀，飾筆、飾符大量出現。形體裝飾是楚文字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孫偉龍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文字羨符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09年）對部分楚文字的“羨符”進行了研究。裝飾性部件從對音、義的表達角度觀察是零功能，是羨餘，所以稱之為“羨符”，但從表層結構的角度觀察，具有裝飾功能，並非完全多餘。文字理論中沒有了裝飾部件或羨符，就是系統性缺陷，直接導致構形闡釋中把裝飾部件強解為表意字符，《說文解字》就因此犯了系統性錯誤。楚文字中的飾符逐漸受到重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問世。視覺符號追求美，是文字學與書法學彼此相通的橋梁。

文字的形體是通過書寫完成的，從書寫的角度關涉到文字系統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字體的形成與演變。字形向簡化的方向發展，字體筆劃向平直的方向發展，都是漢字發展的“規律”，其驅動力來自書寫追求簡便。

書寫與構形系統的變化。書寫簡化導致產生大量的記號字，文字構形系統由以表意、形聲為主向著以記號字為主的方面發展。

書寫是書法藝術主要研究的對象，以漢字書寫求美為主的書法成為一門獨立發展的藝術，是漢字的一大特點。漢字學一般只研究書寫的結果，自覺把“書寫”從研究對象中剝離出去。楚文字書寫是楚文字學的一個重要方面，希望能夠汲取書法研究的長處研究其表層結構。楚文字書法方興未艾，不僅湧現出一批以楚簡書法見長的書法家，而且已經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書法對書寫工具、載體、書家學識與技藝都有一定要求。朱友舟教授系統研究過楚人使用的毛筆，還有專著《戰國楚簡書風研究》系統探討楚簡書法，^⑩對我們的研究多有助益。

文獻中對先秦字體的認識局限於文獻記載與以青銅器銘文為主的一些銘刻，字體概念如籀文、大篆等糾纏不清。青銅器銘文是特殊的規範字體，大都經過三次“書寫”才能完成，無法看到毛筆字跡的原初狀態。楚文字載體有大量的竹簡寫本與抄本，展現出眾多不同風格的字跡。把楚簡加以斷代，可以歸納各個時期的書體特徵，加以分類。楚文字有多種不同類型的字體是事實，至於如何命名，僅僅是話語系統問題。包山簡中的一些文書簡與漢代的一些文書簡比較，字體特徵已經高度相似。如果稱之為行書或行草，大概不會有人相信，但事實上，毛筆書寫的這種日常應用書體的源頭應當更加久遠，也有更高的相似度。

楚文字書手與字跡的分類研究已經相當成熟，李松儒在這方面貢獻尤多。字跡分類有助於竹簡編聯、文本流傳研究，開拓了楚文字研究的廣度。

從楚文字書寫的角度觀察文本的形成、文字的書寫過程，有多重價值。王先虎博士本科、碩士都是書法專業，博士論文以《書寫與楚文字形體研究》為題，探討了相關問題（清華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25年）。

（二）楚文字的上古音問題與上古音研究

語音是語言符號的物質載體，記錄語言的文字必然記錄語音。由於漢字不直接表音，表意字、記號字等無法直接顯示其讀音，形聲字即使有表音字符，隨著字形與語音的演變，很多也變成了孤立的記號。漢字與語音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使其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根據當時、當地的實際語音進行換讀，這樣就越發遮蔽了文字記錄語音的功效。很長時間內，人們用當時的語音換讀先秦經

籍中的文字理所當然。直到清代古音學大發展,從材料中歸納出上古音系統,使經籍訓詁大明。古文字用上古音階段的文字記錄上古音,無論是對上古音研究還是利用古音解決出土文獻的釋讀,都有著更加直接的作用。由於楚文字材料很多,楚文字的上古音價值就更加突出。

上古音的韻部是根據文獻語言材料歸納出來的,所以實用價值很高,可以充分利用上古音解決文獻釋讀問題。出土楚文獻中有大量的韻文、假借字、諧聲字、異文等上古音材料,首先需要對其進行系統的搜集與整理,這是必要的基礎研究。劉波的學位論文《出土楚文獻語音通轉現象整理與研究》(吉林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13年)曾經做過比較全面的整理與初步研究,論文獲吉林省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白于藍教授的《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收入大量的楚文字用例。

出土楚文獻材料中反映出來的上古音現象非常複雜,很多突破了文獻語言材料歸納得出的認知。工具書不論採用19紐22部還是22聲母30部,都是一個呈現主體的框架。用這些古音系統解釋南北古今,有些不能密合或完全不通。把特定時代、特定條件下發生的通轉現象當作證據去釋讀所有材料,就會出現無所不通的氾濫。由於出土楚文獻的大量出現,利用這些材料嘗試探討楚國方音的研究也提上日程,趙彤先生的《戰國楚方言音系》廣有影響。

根據現有的楚文字材料構建楚文獻的語音系統是否具有可行性值得探討。將典型的楚文字與底本為外來古書等非典型的楚文字分別歸納,可以觀察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規律性差異。通過深入細緻的描寫分析,即使得出差異不大的結論,也可以看到先秦時期楚地方言與中原通語的一些實際情況。根據新材料,上古音研究需要細化是大家的共識。這方面已經有很多的研究成果,需要總結其得失,向前推進。

楚文字釋讀、楚文字考釋、楚文字構形都離不開楚文字的語音研究。

楚文字中有大量的語音現象需要解釋,“疑難音”比“疑難字”更加突出。例如“李”字《說文》分析為“從木,子聲”,楚文字構形上“來”下“子”,理解為“來”、“子”雙音符沒有問題,但據此得出來母與精母相通就不可信。“李”字可上溯到“釐”及其各種異體,用法有別,讀音也分為舌音和齒音兩個系列,不能用通轉簡單解釋,需要更全面的考慮。楚文字讀音研究可以從疑難音入手,像疑難字一樣一個釘子一個釘子地拔,只有經過深入研究和詳密考證,才能確定每個字的音韻地位。在這種具體問題解決過程中逐漸歸納出規律,驗證或建立起符合實際的體系。

根據楚文字的實際讀音,歸納出一部《楚文字聲韻表》,後面附上疑難音歸字說明,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由於主要依靠傳世文獻材料建立起來的古音系統自身的局限,其解釋力也受到限制。中外學者利用古音學、音系學等理論,把材料擴展到漢藏語系、方言、對音等材料,語音系統構建得更加周密並構擬出音值。這兩種研究方法應該互補,共同推進古音學的進展。古文字學界盡量避開厚此薄彼、攪入到門戶之爭。不論是什麼理論方法,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具有充分解釋力的,就是好的理論方法。這是很專精的學問,張富海、葉玉英、鄒可晶等一批古文字與上古音兼修互證的青年學者已經做出很好的成績,期待有更多的突破。

沈奇石的博士論文《楚簡帛用韻文獻整理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學位論文,白於藍指導,2024年)已經對楚簡帛用韻進行了系統整理,上古音理論有深厚的積累,目前博士後階段正在對楚文字音韻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博士生趙市委以《楚簡典籍類文獻異文中的上古音韻問題研究》為題也探討了相關問題。

(三) 楚文字的語義系統

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文字研究的核心是其所記錄的語義,字形分析、語音探索等都是手段。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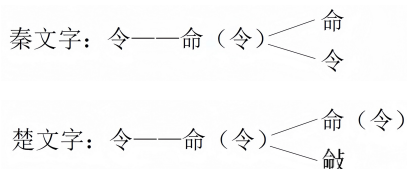
文字語義研究可以借鑑詞匯學、語義學的理論方法,但要從古文字的特徵與研究目標等實際情況出發。語義是語言的意義,對於文獻語言來說,既離不開文字也要謹防文字的干擾。

漢字是表意系統的文字,古文字中有些疑難字的語義或部分語義根據文字構形與上下文語境可以脫離語音獲得。這一特點可以充分利用,但不能誇大,防止走入據形濫訓的誤區。

首先,要剔除字書說解中的非語義。例如《說文》中“谷,口上阿也”“𠂔,舌兒(貌)”“也,女陰也”等等,這些是在文字構形誤解的前提下附會出來的構形“字義”,與這些文字所記錄的語義沒有任何關係,不能以此作為訓釋的依據。

第二,要區別字義與語義。“字義”是字形所表達出來的視覺可見的意象或字符拼合出來的意義,例如甲骨文中“𠂔(休)”(《花東》53)的字形意象是歪脖子“木”下有個人,“𠂔(赤)”是“大火”。字義是文字構形的理據,與語義之間有一定的聯繫,在詞義明確的情況下可以判斷為語義的某一個邊緣特徵義。例如知道了“休”有庇蔭、休息、美好等意義,就可以逆推這些意義與人在歪脖子樹下之間的聯繫,就可以知道是庇蔭、休息的具象化。字義“大火”的意義可能是“旺”,也可能是“燒烤”,只有在明確了“赤”的意義之後才能確定“大火”是顏色的聯想。語義有很多特徵義,造字時選擇哪一個作為編碼理據,是當時的文化背景和造字者的思維習慣,具有一定的任意性。由字形表達的意象推測其所記錄的語義是什麼,會有無限可能。

第三,要區分文字與語義的不同對應關係。“令”是倒口下面一個跪坐的人,表示命令義,既可以是動詞,也可以是名詞。加意符“口”形聲化成為“命”,“命”與“令”異體通用。在這個意義上,直到今天即使雙音化為“命令”,依舊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在秦系文字中,“命”與“令”的分化是在“令”表示職官令長之“令”、法令之“令”後,異體分化,音義有別,二字不能互通,成為秦漢以來的用字規範。楚文字中也區別命令與職官之“令”,但與秦文字大不相同:“命”與“令”保持一字異體的傳統,另外為職官之“令”造了一個專字“𠂔”。



從文字記錄語義的角度精確表達,就不能簡單地說楚文字的“命”與“令”就是秦漢文字的“命”與“令”,它們與所記錄的語義不對等。秦系與楚系同形字更能突出反映出文字所記錄的語義差異,例如楚銅器銘文中的“𠂔”和遣策中的“𠂔”分別記錄{廚}和{𠂔},與我們熟悉的形音義關係不同。

傳世典籍語義系統以及與文字的對應關係經秦漢整理規範過,一定程度上與楚文字不是同一個系統。一方面我們不能簡單用秦漢文字語義系統去理解楚文字的語義系統;另一方面雖然楚文字消失了,但在文本轉寫中還會留下其影響。只要從材料出發認真觀察,就會發現很多楚文字記錄語義的獨特現象,需要進一步深化、細化。

楚文字、楚文獻雖然已經有足夠大的體量,但目前的研究還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釋、文本整理、字形表編著、研究成果匯集等基礎研究。對楚文字個體或部分小群體的詞義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但從語義的角度進行系統的研究還很不夠。

楚文字詞義的研究成果目前主要是從材料出發,在整理、歸納、描寫過程中發現的各種語義現象的專題研究。系統的楚文字意義研究和楚文字詞典都很稀缺。

楚文字研究對詞典有急迫需求。詞典不論是釋讀文本還是語義研究都是必須的。楚文字目前還很難自學,和沒有切用的工具書密切相關。編寫高質量的詞典,尤其是從古文字文本歸納義項的詞典,不僅對編者的學識有很高的要求,而且工作量巨大,需十年磨一劍。一些評估體系還不算作有效科研成果,所以高質量的詞典很難產生。楚文字詞典可以從楚常用詞詞典或部分材料的專題詞典做起。把一批材料定為研究對象,進行文本斷代、釋義、分詞、義項歸納,最後按照一定的體例編成詞典,操作相對容易。我們進行的楚帛書再整理後面附有《楚帛書詞典》,是這類專題詞典的雛形。

主題、專題詞典例如楚遣策名物詞典、楚文獻人名詞典、楚文獻官名詞典,是各類專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有學者已經開始編纂,也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常用詞詞典的道理和常用字字典相同,結論大都能確定,對於楚文獻釋讀應用價值最高。常用詞詞典編纂不能僅僅是匯集已有研究成果的工夫活,更要進行實實在在的研究,考證其在文本中的意義,歸納其義位,在此基礎上建立義項,最後進入詞典。人名、地名、官名等另有研究目的與方法,可以除外。

古代以單音詞為主,所以楚文字常用字字典與楚常用詞詞典重合率很高,需要彼此互相照應,突出重點,滿足不同的需求。

石從斌的博士論文《楚簡常用詞研究》(黃德寬指導,2023年)已經對戰國楚常用詞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考證和研究,論文獲評清華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基本上完成了楚常用詞的理論構建,目前受到2024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暨優秀博士學位論文出版專項資助,期待早日出版。

(四) 楚文字的深層結構與楚文字的構形

共時文字系統中的文字呈現出來的是視覺形體和對語言符號再編碼的方式,我們稱之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深層結構之“深”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是與視覺可見相對應,是看不見的編碼原理,有學者稱之為“內部結構”;第二,喪失了理據的記號字,只剩下與其他形體相區別的表層結構,其構形理據藏得很深,通過歷史溯源才能得知。

現代漢字對探求深層結構有很大的局限,例如“强”字表層結構是左“弓”右“虽”,會正確書寫,記住其音義,能夠正確應用即可,其深層結構藏得很深。《說文》字形作“強”,以為“從虫,弘聲”已經是誤解。秦文字就寫作“强”,應當是從虫,弘聲。楚文字中有“弘”、“𠂔”等不見於字書的字形,音義用法正是{强}或{剛}。上溯到甲骨文,綜合考慮,基本上可以確定就是“剛”與“强”的本字。字形分析是古文字考釋的基礎,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梳”的表層結構是“木”和“尢”構成的左右結構。記錄的語言是一種以木為主要材質,用於疏通頭髮的工具。“木”與“梳”的意義有關聯,“尢”與“梳”的音、義都沒有直接關係,是個半記號字。深層溯源,“尢”是“疏”的省形,既表示意義(齒稀疏與篦子的齒密相對應),也表示語音,所以叫做省聲字。這種深入的構形分析對於現代漢字“梳”的識讀與書寫都太過迂曲,但對於古文字考釋就十分必要。楚文字中有一個上下結構的“𠂔”(仰天湖34號簡),是遣策中記載的器物。上部“𠂔”中的“疋”,就是“疏”左側的音符,下部像梳子的形狀。儘管上、下兩個構字部件都不見於已知文字系統,但根據其構形分析,可以確定其記錄的就是“梳”這個詞,與墓中所出器物也吻合。其構形類型就可以歸入從梳的象形字符表意、疋聲的形聲字。

漢字學的構建從漢字編碼理據解析開始,有其現實需求,那就是漢代學者解讀古文經、考釋古文字的需求。對於從來沒有見過的古文字字形的考釋,明確其構形才能確定其所記錄的音義,明確

其音義才能確定其構形原理,二者表裡相依,不可分離。楚文字構形研究回歸構形研究的原初目的,有助於楚文字考釋。一旦文字所記錄的音義已經確知,就可以算作“已釋字”,進一步明確構形理據就是“完全釋字”。完全釋字需要充分的條件,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不需過度追求。例如“不”與“帀(師)”是楚文字中的常用字,記錄的音義明確,即使上溯也構形不明。在目前的材料條件下提出各種假設都只是可備一說而已,耗費大量的精力徒增煩擾。構形研究不能流為脫離實際,牽強附會,瑣碎分類。

構形是文字構成的動態過程,任何一個共時系統中的文字,都是在人們對表層結構需求和深層結構需求兩種動力推動形成的結果。表層結構追求區別明確、書寫簡單、形體美觀等,深層結構追求表達準確、理據明晰。就以“陵”字為例,從西周文字到楚文字的各種異體的構形過程可以描述,可以解釋:

三年癩壺——高陵君弩機 裏耶 8- 527 背

阜伯鬲——新蔡乙四 60——鄂君啟車節——《璽匯》164

構形的結果就是文字系統中不斷出現新的形體或新的音義結構。每一個時間節點上的楚文字都有其形體、所記錄的語言和編碼形式,都經過編碼造字、應用變化、理據消失和理據重構的過程。《璽匯》164 的“陵”靜態觀察就是上“來”下“土”,從土來聲。但其形成過程經歷了意符“𠂔”變形為音符“來”,音符“欠(冰)”轉變為意符“土”(也可能是累增意符),截除省略意符“阜”等複雜的過程。

漢字研究有必要區分“結構”與“構形”,使二者有明確的界域。“結構”是構形的結果,可以從形體結構與編碼原理兩個角度進行靜態觀察與分析。“構形”可以理解為支配式複合詞,重點是如何構成這個形體。構形理論與實踐的價值主要在於動態研究漢字,考察結構形成的過程。

構形過程中形成的基本結構類型頗有分歧,“六書”、“三書”、“四書”、“二書”各有道理。我們以漢字編碼方式和構形發展史為標準,把漢字的基本類型區分為記號、表意、表音、形聲四種,每一種都有多種下位類型。所謂“基本類型”是指漢字發展各個階段都存在,在某一階段是主體構形形式。漢字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基本構成方式與構形類型不變,“基因”不變。目前的材料呈現的楚文字發展歷程比較短,但由於戰國材料極其豐富,地域性很強,構形研究有很大的發展前景。楚文字的構形研究無論是對於楚文字考釋,還是漢字發展史的細化都很有意義。

楚文字構形有兩條路徑相輔相成,靜態的結構描寫和動態的構形過程描寫。

結構由一定的結構單位按照一定的原理組合而成。結構描寫首先要分解出結構單位。出於古文字研究的目的,楚文字構成單位的拆分主要以音、義功能字符為核心。記號字如果不溯源就不必進行理據分析,只進行部件拆分。例如“𡗗”(包山 18)是“鑄”的表意字的簡化,靜態觀察該字已經完全記號化,上部是“𠂔”與“大”或“人”,下部是楚文字中的“皿”。靜態構形描寫不能缺少記號字與裝飾字的理論,一些完全喪失理據的記號字只需區別構字部件。分析出結構單位,根據結構單位的功能與組合方式確定文字的結構類型,這樣就可以看清楚文字的結構全貌。

動態的構形描寫展現結構的形成過程,解釋其變化的原因。例如上面說到的楚文字“鑄”,列出字譜,可以知道上面是倒過來的容器或者變形“火”,下面是“皿”,可以清晰看到記號化的過程。楚文字系統中的直接構字字符可以全部歸納出來,根據其功能加以區分。

楚文字構形研究不能離開文本進行簡單的操作。一切構形現象都是在文字應用過程中產生,構形研究的最初目的也是為了古文字釋讀。只有從文本釋讀過程中產生的構形研究才可能符合實

際,才具有原創性。回到文本釋讀,構形研究才具有實用性、可驗證性。

楚文字構形研究不僅是理論構建,更重要的是實際操作,即在構形研究中發現新的構形方式、解決文字釋讀的問題或為解決問題提供文字學的證據。如果研究了一批楚文字材料的構形,卻沒有發現、解決任何楚文字釋讀中的問題,這種“楚文字構形研究”的學術價值就需要重新評價。

從文本出發的漢字構形研究難度很大,工作量也很大。可以從具有某種共性的材料做起,也可以從某一時段的材料做起。只要深入進去,就會發現我們對楚文字的構形很多都是似是而非,是未來學術的增長點。也可以以一類字為研究對象,如楚文字表意字、楚文字形聲字、楚文字記號字等都可以做專題研究;也可以以彼此關聯、彼此影響的一群字為研究對象構成很多的專題研究;還可以以一個構形單位為核心探討其在所有構形中功能和演變,這更是一個開放的課題。

楚文字構形研究的成果很多,恕不能一一例舉。我們也做了一些嘗試,曾與肖攀合作《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中西書局 2015 年出版),肖攀博士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楚文字構形分析與疑難字考釋”,對於楚文字的構形有一些初步認識。清華大學也有博士生應用不同的構形理論對楚簡文字構形進行探索。對全部楚文字進行構形的深入研究,任重道遠,需要更多的學者參與進來。

(五) 楚文字應用、演變與字際關係研究

楚文字絕大部分存在於當時的文本中,呈現出應用的真實情況。楚文字應用與字際關係成為楚文字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已經積累得十分豐厚。

《說文》的後二書“轉注”與“假借”,學者很早就發現與前四書的文字結構理論不同,多有困惑。如果把六書理論放在古文釋讀過程中思考就很容易理解。釋讀出土文獻,除了新出現的文字需要通過字形分析去釋讀外,以假借為主的“一形(字)多義”和以訛書異體、異構異體、通假等構成的“一詞多形(字)”普遍存在,必須隨文釋讀,一字多詞是假借,多字一詞就是轉注。

楚文字在發展過程中自成表達系統,與秦漢以來形成的文字與語言的對應關係多有不同。

楚文字所記錄的語言不斷發展變化,為了更加準確記錄,不斷分化。在應用書寫過程中不斷簡化、裝飾,發生種種變化。各種變化的結果構成楚文字之間歷時、共時的錯綜複雜關係。

假借字、異體字、同形字、同義換讀、古今字等等,都是文字應用過程中的字際關係,這也是個開放的方向,需要大量投入。張峰的博士論文《楚系簡帛文字訛書研究》(吉林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12 年),2013 年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資助,出版了《楚文字訛書研究》一書;黃一村博士的《清華簡〈壹—拾〉用字差異現象與文本研究》(清華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22 年),2023 年“戰國楚地典籍類文獻特殊用字現象整理與研究”獲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支持。曹雨楊博士的學位論文《戰國楚文字用字系統研究》(清華大學學位論文,李守奎指導,2024 年)探討了“用字系統”。這些成果都從某一個側面對楚文字的應用中的各種現象進行了研究。

楚文字應用、楚文字演變、楚文字系統等做得很不夠,是楚文字研究的薄弱環節。

(六) 楚文字與其他地域文字比較研究

區別地域文字的前提是地域之間有差別,各地域的文字有特色。西周時期雖然諸侯林立,但無需分出地域文字,就是因為目前所見材料沒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楚文字與其他地域文字相比較,有明顯的特色:第一,在所有地域文字中,材料最豐富。第二,簡帛古書、遣策、卜筮祭禱記錄等形制獨有,內容獨特。第三,文字字體、結構、構形過程有特色。第四,文字應用、字際關係有特色。

特色因比較而來,沒有比較,就無從見到特色。通過與其地域文字比較,這些特色才能具體化。

王永昌博士的《清華簡文字與晉系文字對比研究》(吉林大學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李守奎,2018年),進行了楚與晉文字的對比嘗試,2019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資助,有所完善。孫偉龍博士也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曾、楚文字比較研究”。

目前楚文字與秦文字、齊文字的對比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燕文字材料太少,與楚文字也沒有什麼糾結,暫時可以放緩。吳越文字進入戰國已經衰微,與楚文字之間的關係還需要仔細對比後再做推斷。

因為材料數量不對等,內容不同質,目前的對比研究只能根據已知的材料就事論事。所謂“只見於楚文字的文字或構形”,如果有三晉古書簡問世,就可能不再是楚文字的特色。

以上六節主要在文字學、漢字學的視域下,對楚文字分別從書寫的形體、記錄語音、記錄語義、對語言再編碼的構形方式、文字系統與字際關係以及地域文字之間比較等六個方面對這個地域系統加以描寫,展示地域文字的特徵與研究價值。另外,我們在工具書編纂、數據平台建設、楚文字與楚文化的發展等方面對楚文字學加以拓展。

駱珍伊、沈奇石二位博士後在楚文字工具書的編纂方面用力甚勤,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同類型的工具書可以解決文本釋讀中的不同問題。目前楚文字工具書主要表現為字編、集釋等資料匯集,尚缺少完備的字典、詞典。楚文字工具書理論建設不足,亟待完善。

賈連翔副教授、張馳博士和博士生趙相榮與出版社合力搭建起在楚文字信息化處理平台,目前已經將所有的楚文字做成數據庫。

胡霖博士對楚文化深有研究,目前正在以楚文字的形成、發展演變為線索,探討楚文化的內涵發展與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融合過程。

限於篇幅,我們對上述“楚文字學”的各節內容不一一展開。

五、結語

楚文字主要存在於出土文獻中,是古漢字的一部分,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形成其地域特徵。楚文字學從釋讀、利用楚文獻和全面認識古漢字發展史的目標出發,在對楚文字的載體、書寫、所記錄語言、結構系統、構形過程、字際關係等全面研究的基礎上進行規律的探索和理論概括。

我們把所有與楚文字相關的研究都叫做學科的“建設”,把楚文字學框架的形成叫做“構建”。通過多年的建設,基本上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目前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一)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二)建設楚文字信息處理平台,完成楚文字數據庫;(三)完成楚文字專題文字編的編輯;(四)系列博士學位論文、博士後出站報告展開楚文字專題的深入探討;(五)在以上實踐基礎上,我們構建起“楚文字學”的框架,在不同的視域下觀察楚文字,總結規律,概括理論,不斷補充、修正,以期呈現一部有創新、有用途的理論著作;(六)理論指導實踐,全面系統對楚帛書再研究、再整理,完成《楚帛書的再整理》與《楚帛書新探》。我們扣住四個方面構建楚文字:古漢字的一部分,地域文字,理論建設,理論指導實踐及專門知識對其他學科的作用。

作為地域文字,需要描寫出系統的特殊性,對於文本釋讀來說,主要是解決差異帶來的疑難,所以地域特色必然是研究的重點。如果放在漢字與文化傳承的大背景觀察,更需要從“古漢字”的角度思考,不僅看到地域文字之間的差異,更要看到地域文字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這才是中華文化的主流。

[文章在寫作過程中,承蒙侯瑞華與趙相榮協助處理文檔、校對文稿並提出修改意見,特此致謝!]

- ①黃德寬:《新時代古文字學學科建構》,北京:《歷史研究》,2024年第12期。
- ②李守奎:《漢字理論與漢字闡釋概要》,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24年,第3~8頁。
- ③李守奎、白顯鳳:《楚文字的歷史發展與地域文字系統的形成》,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第1期。
- ④湖南省博物館等編著:《長沙楚墓(下)》圖版一五九圖8、圖12,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 ⑤故宮博物院編,羅福頤主編:《古璽匯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53頁。
- ⑥李守奎、肖攀:《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95頁。
- ⑦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第39~53頁。
- ⑧肖毅已將此璽定為楚璽。肖毅:《古璽分域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18年,第26、130頁。
- ⑨李守奎:《系統釋字法與古文字考釋——以“石”構形功能的分析為例》,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年第4期。
- ⑩周世榮:《楚邕客銅量銘文試釋》,武漢:《江漢考

古》,1987年第2期。

- 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5591頁。
- ⑫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撰:《出土文獻與古文字教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年,第685頁。
- ⑬李守奎:《清華簡〈繫年〉中的“𠂔”字與陳氏》,見《古文字與古史考:清華簡整理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第146~154頁。
- ⑭劉波:《釋楚邕客銅量中的“故”字》,武漢:《江漢考古》,2012年第1期。
- ⑮李守奎、趙相榮:《信陽簡遣策分組編聯與補釋》,《簡牘學與出土文獻研究》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年,第74~92頁。
- ⑯李守奎:《楚帛書乙篇的文本復原與文字辨釋》,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3年第2期;李守奎、胡霖:《楚帛書的圖文結構與神話敘事》,長春:《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4年第6期。
- ⑰朱友舟:《戰國楚簡書風研究》,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23年。

作者簡介:李守奎,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教授,教育部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字學會副會長,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曾入選2016年度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長期從事古文字與出土文獻、漢字學等方面的學術研究和漢字文化的普及工作,先後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兩項。參與清華簡整理與研究工作,獲“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出版著作《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書(一至五)文字編》、《古文字與古史考》、《漢字學論稿》、《漢字為什麼這麼美》、《漢字闡釋十二講》、《漢字理論與漢字闡釋概要》等十餘部著作;在《文物》、《考古》、《中國史研究》、《古文字研究》、《中國文字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復旦學報》、《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等刊物發表文章一百多篇;主編《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清華名家演講錄》等。其中《楚文字編》、《包山楚墓文字全編》、《清華簡〈繫年〉文字考釋與構形研究》等獲“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二等獎,《漢字說解一百五十講》入選科技部“2023年度全國優秀科普作品”。

[責任編輯 劉澤生]